

## 利瑪竇與徐光啟的深厚友誼

孫旭義

**【摘要】**鑒於當今全球化，友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迫切和重要，因為它能將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團結起來，遏止各種緊張趨勢，並跨越多元衝突，更讓人深度活出人性的尊嚴和信仰的喜樂。在中外古今無數的友誼典範中，我特別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利瑪竇與徐光啟的深厚友誼，他們堪稱當代福傳的楷模，因為真正的友情源自天主，扎根於聖言，生活於人性內，樹己立人。徐利二賢從內心深處尊重他人，無論貧富貴賤，始終本著服務於人的獻身精神，慷慨喜樂地跟所有人去分享他們的一切精神和物質財富。他們這種言行一致地活出自己所教導的榜樣，能幫助我們學會如何以宗教信仰匡救時弊，挽回世道人心，又以理性科學振興實業，惠及天下蒼生。二位聖賢的深厚友誼，也告訴我們今日如何才能活出真正的友誼，在不斷互相學習中，他們齊心協力朝著公共福祉的方向邁進，因為不是通過那旨在達成自身利益的工具性對話，而是那源自真理的智慧型對話，才能真正的追求更高尚的真善美。

**【關鍵詞】**利瑪竇，徐光啟，友誼，福傳，科學，理性，信仰

利瑪竇（Matteo Ricci）與徐光啟以實際行動活出了讓人驚歎不已的深厚友情，因為真正的友誼遠超出人的預期。基督愛的新誠命在本質上與友誼也是息息相關——「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 15:13）——二位聖賢的一生正是為了

朋友捨命的最佳見證。他們為了完全活在基督的愛內，成為獻身友誼的殉道者。

友誼是利瑪竇福傳使命的基本特徵，他不僅將友誼作為知識主題傳播，更是建立真誠和深厚友誼的人。2010 年，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之際，教宗本篤十六世盛讚說：

利瑪竇神父在向中國傳揚福音時發現，他的交談過程驅使他進入更廣闊的交流，因而受信仰驅動的人際接觸，演進成不同文化間的對話；這種無私的對話，擁有不受任何經濟或政治權力左右的自由，是在友誼中進行的，它使得利瑪竇神父和他的後繼者的工作，成為中西關係史上最崇高及最令人喜悅的巔峰之一。

他進一步言及如此偉大的事業之所以成功，也有賴於中國教友的慷慨付出：

不過，對利瑪竇神父的欽佩，不應使人忘記與他交談中的中國人的角色及影響。他所作的決定，並非出於抽象的信仰本地化策略，而是按所發生的所有事件，包括他鏗而不捨的與人接觸及經驗，而確立的。因此，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應歸功於他所接觸到的中國人。他在生活的各層面都與人接觸，但與一些朋友和弟子卻建立了更深厚的友誼關係，其中包括四位卓絕的皈依者，被譽為『初期中國天主教會的柱石』。他們中的首位及最著名的就是祖籍上海的徐光啟。<sup>1</sup>

鑒於當今全球化，友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

<sup>1</sup> Benedictus PP. XVI, *Quarto recurrente saeculo ab obitu Patris Matthaei Ricci, S.I.*, 29 maii 2010, *AAS CII* (2010), pp.358-360. 中文全文見：教宗本篤十六世：〈教宗在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紀念致詞〉，《鼎》第 30 卷，總第 158 期，頁 4-7（《鼎》的翻譯初稿由本文作者提供）。

因為它能將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團結起來，遏止各種緊張趨勢，並跨越多元衝突，更讓人深度活出人性的尊嚴和信仰的喜樂。在中外古今無數的友誼典範中，我特別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利瑪竇與徐光啟的深厚友誼，他們堪稱當代福傳的楷模，因為真正的友情源自天主，扎根於聖言，生活於人性內，服務於他人。

## 一、利瑪竇——來華傳教士的典範<sup>2</sup>

利瑪竇早已聞名遐邇，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更是傳為佳話。利瑪竇被譽為教父般的中華傑出傳教士<sup>3</sup>、天主教福傳者的典範、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偉大的西方「漢學之父」<sup>4</sup>，是耶穌會的座右銘——愈顯主榮（*Ad Maiorem Dei Gloriam*）——最傑出、最正宗的詮釋者之一，地球上的首位「世界公民」<sup>5</sup>，照亮人類未來道路的燈塔<sup>6</sup>。故此，在學術界研究並探討他為中國社會和天主教會，乃至為全人類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的專家學者多不勝數；而本文則著重品味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及卓絕的信仰品格，期望有益於建樹基督信仰神學的本地化。

---

<sup>2</sup> 本節原見於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孫旭義：《利瑪竇其人》，2017-04-21：<http://project.wenboyun.cn/xhwh/wap/news.php?id=202>。

<sup>3</sup> Cf. Benedictus PP. XVI, *Quarto espleto saeculo ad obitu Matthaei Ricci*, 6 maggio 2009, *AAS* CI (2009), pp.536-538. 本篤十六世稱讚利瑪竇神父「就像教父們面對福音與希臘—羅馬文化相遇時所作的一樣，他高瞻遠矚，努力與該國的文人學士們尋求恒久的默契，為基督信仰在中國的本位化工作奠定了基礎。」（作者翻譯）

<sup>4</sup> David E. Mungello (孟德衛),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sup>5</sup> 參閱[日]平川佑弘著，劉岸偉、徐一平譯：《利瑪竇傳》（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平川佑弘稱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並將他看作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

<sup>6</sup> Claudio Giuliodori, *Discorso su padre Matteo Ricci nell'Università Fu Jen*, 2012.02.20: 「歲月的流逝不但沒有使利瑪竇的偉大變得暗淡；相反，人們今天比任何以往更欣賞他的文化底蘊、道德境界和高貴精神，不僅僅因他是歷史巨人，而更因他越來越像照亮教會和人類未來道路的燈塔。」

## 〈一〉利氏生平之我見

孟母三遷告訴我們環境會深刻地影響人。為了更深地瞭解利瑪竇，需要先瞭解他的故鄉。1552 年 10 月 6 日，利瑪竇出生於瑪律凱中部，坐落在丘陵之上的瑪切拉塔（Macerata）古城，省市兩政府所在地，目前約有四萬多人口，而利瑪竇時代只有一萬二千多人。<sup>7</sup>時至今日，人們依然可以深深感受到它淳樸的民風、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藝術傳統及自然環境之美。

父親若翰·利啟<sup>8</sup>對長子瑪竇特別器重，懷著望子成龍的心願，特意找到城中德才兼備的白啟完神父（Nicholo Bencivegni）作他的啟蒙老師。小瑪竇天資聰穎，記憶力超強，讀書過目不忘，白老師非常喜愛。利瑪竇對恩師總是滿懷感激之情，來華後仍時時念起。1599 年從北京寫信給同會弟兄科斯達神父（G. Costa）說：「恩師本人親筆寫信給我，字裡行間充滿昔日的慈愛。當我們還年少無知時，他就充滿愛心地對我們諄諄教導，使我們能有今日。」<sup>9</sup>

利瑪竇九歲進入耶穌會所辦的學校，此學校<sup>10</sup>至今保存完好，該校由十三位耶穌會士於 1561 年創辦，當時城中很多人爭相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去那裡求學，其文化氛圍濃厚可想而知。利瑪竇讀書非常用功，直到十四歲結束學業。熊三拔神父（Sabbatino de Ursis）

---

<sup>7</sup> Cf. Otello Genntili, *Apostolo della Cina P. Matteo Ricci S.J.* (Roma: Tipografia Poligrotta Vaticana, 1982), p.21.

<sup>8</sup> 利瑪竇的父親若翰·利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是藥商，也是城中民法委員會成員，1596 年成為市政議員。Cf. Gianni Criveller, *Portrait of a Jesuit: Matteo Ricci*, (Macau: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0), p.17.

<sup>9</sup> Matteo Ricci, *Lettere* (Macerata: Quodlibet, 2001), p.360.

<sup>10</sup> 1773 年耶穌會被解散，而其地產被改為 Mozzi Borgetti 圖書館，現屬於政府圖書館。它是瑪律凱最大的圖書館之一，藏書三十五萬餘冊，除了一萬多份手稿之外，還有 16 世紀前的三百冊珍貴古籍，以及 16 世紀的四千餘冊古書，其中絕大部分源自利瑪竇少年學習時的耶穌會學校。Cf. Pio Cartechini, *Macerata e la sua biblioteca*, in *La biblioteca Mozzi-Borgetti di Macerata* (Roma: Editalia, 1993), p.31; Libero Paci, “La soppressione dei Gesuiti ed i primordi della biblioteca comunale di Macerata,” *Studia Picena*, 40 (1973): p.1.

曾經回憶說：「利瑪竇是這座學校的第一批學生，他研習人文學科和修辭學，成績優秀，名列前茅，特別是在德行及屬神的方面，孩子進步神速，那時他就已經有心修道。」<sup>11</sup>

1568年，政府批准打造一座當時最先進的天文機械鐘，由著名鐘錶匠拉捏利（Ranieri）兄弟三人於1571年打造完畢，安置在市中心廣場鐘樓之上，成為瑪切拉塔的重要標記。我們無法確定利瑪竇是否親眼目睹此傑作，因為同年利瑪竇前往羅馬智慧大學攻讀法律。我們可以推測他密切關注家鄉的這件大事，並對其中的機械原理深感興趣。這為他來華做了鋪墊，也正是自鳴鐘為他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先是1583年在肇慶吸引當地官員鄉紳們絡繹不絕地前往「仙花寺」參觀各式西洋物品；1601年又呈獻給明朝萬曆皇帝，皇帝非常欣賞，准許利瑪竇出入皇宮負責自鳴鐘的管理修繕。

1568至1571年間，利瑪竇在羅馬大學法學院學習三年。1571年8月15日，利瑪竇正式申請加入耶穌會，次年5月發初願，加入耶穌會羅馬公學院（即額我略大學前身，本文之後簡稱為羅馬學院）的文學院和哲學院，必修課程包括兩年修辭學，三年哲學，三年神學。1572年9月，他開始兩年修辭學的課程，學習希臘語、希伯來語，還有授課聽課時使用的拉丁語，其課本大部分選自古代作家的經典作品。利瑪竇編撰的《交友論》和《西國記法》就是以那兩年修辭課所吸收消化的內容為基礎。為期三年的哲學課程包括邏輯學、倫理學、道德論、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等。他在哲學三年級時，向長上申請去遠方傳教。1577年獲准赴東印度<sup>12</sup>傳教。

傑出天文學和數學家、德國耶穌會士克拉維烏斯（Christopher Clavius, 1537-1621）（在中國，他被稱為「丁先生」），自1563年起

---

<sup>11</sup> Cf. Otello Gentili, *Apostolo della Cina P. Matteo Ricci*, p.25.

<sup>12</sup> 青年耶穌會士向上司呈遞「赴印申請」（*Litterae indipetae*），是耶穌會特有的文獻，以「印度」一詞泛指廣袤的傳教區：西印度指美洲，東印度指亞洲。

在羅馬學院教書，他是對青年利瑪竇的成長影響最大的授業恩師之一。1574 年，他出版了從希臘語翻譯並注釋的歐幾里得《原本》，被譽為 16 世紀的「歐幾里得」。1607 年徐利合譯出版的《幾何原本》，還有利瑪竇傳授、徐光啟編撰的《勾股義》等都可歸因於羅馬學院的學習。據柯毅林神父（Gianni Criveller）推測，利瑪竇很有可能曾參與丁先生在修曆過程中無數的分析計算工作。儘管額我略曆（即西曆或陽曆）是 1582 年才頒佈發行，但根據利瑪竇於 1589 年制定的中文版西曆一事，可以推測他已涉獵其中，而這部曆法最後由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於 1625 年以《推定歷年瞻禮日法》之名出版。<sup>13</sup>

地理學和製圖學也是兩門利瑪竇在學生時代發展迅猛的學科，他在羅馬學院刻苦專研製圖，來華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繪製的世界地圖有六個版本：1584 年的肇慶版，1600 年的南京版，還有 1602、1603、1608、1609 年的北京版。此外，利瑪竇還自己動手製作自鳴鐘、地球儀、渾天儀、等高儀、日晷及測繪儀器等。

行文至此，我們談到了他接受的理性、信仰和神學等培育，但還是有人會誤解利瑪竇，認為他在中國時心心念念的只是科學與理性（可能也因為有些作者強調此點所導致），而忽略了首要傳教目的。其實，福音見證才是利神父的日常生活，他深深渴望著中國人的心扉能夠向真理敞開，在《天主實義》序言中道出了自己的心聲：

二十多年來，我每日早晚都含著眼淚向上天祈禱，我知道天主憐憫眾生並寬恕他們……一日，幾位朋友使我豁然開朗，儘管我不能完全正確的表達出來，但是也不可以默不作聲。<sup>14</sup>

---

<sup>13</sup> Cf. Gianni Criveller, *Portrait of a Jesuit: Matteo Ricci*, p.28.

<sup>14</sup> Matteo Ricci, *Catechismo. Il vero significato di "Signore del Cielo"* (《天主實義》), a cura di 孫旭義 - A. OLMI, ESD, Bologna 2013, pp.100-102:「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天主矜宥生靈……忽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偷不聲故為不可」。

## 〈二〉利瑪竇來華之困難剪影

在利瑪竇近三十年的傳教生涯中遭遇的困難無法數算，在此我們僅提及二、三，其中最為典型的的就是莫須有的誣讟與控訴，比如利瑪竇被指控綁架兒童，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則被誣告強暴一位新教友的妻子。1592年11月12日，利瑪竇寫信給法比神父（Fabio de Fabi）：

有一年我被指控，並且傳到知府公堂，告我拐賣幼童，將其運送歐洲；有一年則是我的同伴被指控更糟糕的事情……我們多次被人疑為間諜……另外幾次我們被當地捕快審問，指控我們犯了臭名昭著的罪行；多次我們及我們的房子受到石塊的襲擊；在大街上受人辱罵更是家常便飯；我們發現魔鬼的確把我們當作牠家中的死敵。<sup>15</sup>

此外，由於利瑪竇一心希望抵達北京，因此他經歷了行舟之險，喪友之痛。當時利瑪竇陪同兵部侍郎石星同船而行，然而當時日本入侵高麗，而高麗又是中國的朝貢國，時值中國派兵援助高麗之際，船行至贛州的十八灘，觸到暗礁，利瑪竇的船也沉了，河水沖走了船上所有的東西：雖然利瑪竇逃過一劫，但是陪同利瑪竇的中國修士巴蘭德<sup>16</sup>卻溺死河中，這件事令他痛苦萬分。<sup>17</sup>

1600年3月，同會兄弟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與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從澳門而來，隨身攜帶著將要進獻給皇帝的禮物。5月19日，南京的官吏也贊同他們前往北京，於是利瑪竇偕同龐迪我，再次向京都挺進。7月3日，他們一行抵達臨清，被宦官馬堂逮捕，因他想從中作梗搶頭功，作為引薦這些外國人獻給皇帝禮物

---

<sup>15</sup> Matteo Ricci, *Lettere*, pp.160-161.

<sup>16</sup> 巴蘭德，西名 João Barradas，聖名若瑟，是利瑪竇神父培育中國神職的其中一員，還有黃明沙、游文輝等。

<sup>17</sup> 參閱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82。

的功臣。先是連人帶船一併扣押起來，然後轉移到天津城堡，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兩位神父多次請宦官奏疏，並翹首以待皇帝的御批。就在快要失去一切時，馬堂又在行李箱裡搜出十字架，並認為他們心懷叵測。終於在 1601 年 1 月 8 日，萬曆皇帝批示了由這兩個外國人敬獻禮物的奏疏。<sup>18</sup>

### 〈三〉利瑪竇在華之福音生活

利瑪竇是正義的捍衛者及擁護者，更是按福音精神生活出對貧窮人愛德全備的見證，對他而言，福音就是他生活的最終理由。當他初至遠東傳教，就為當地人力爭進入高等學府的機會。一封措辭銳利、敢於承擔的信就是極好的佐證，它是於 1581 年 11 月 25 日從印度臥亞寄給總會長阿誇維瓦神父（Claudio Acquaviva）的，談到關於當地學生怎樣受到歧視一事，他寫道：「本會從來沒有偏袒主義，在印度這裡，許多我們會院有聖德有作為的老神父們，開辦學校，招收所有來就學的學生。」<sup>19</sup>

利瑪竇及同會兄弟們寬恕那些曾經傷害及譏謗，並在官府控告他們的人。傳教士寬恕仇人的舉動令許多國人驚訝不已。儘管中華倫理道德水準很高，但其哲學文化及宗教領域似乎並不太關注寬恕。因此，神父們的仁愛與寬恕深深觸動了無數中國人的心弦，也成了吸引人皈依基督信仰的重要方式之一。1586 年 10 月 29 日，從肇慶致信馬塞利神父：

---

<sup>18</sup> 參閱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頁 388。關於公開展示十字架一事，利瑪竇常常被教中人士批評，因此有必要在這裡澄清一下。在教會初期，十字架苦像既不是時尚，也不是用來在大庭廣眾下展示的。利瑪竇在傳道時並沒有刻意隱瞞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事件，而是如同初期基督徒一樣，他在展示苦像時總是小心謹慎，以免在沒有充分解釋苦像真正意義的情況下，讓那些不明白的人感到困惑甚至誤解。

<sup>19</sup> 利瑪竇著，羅漁譯：《利瑪竇全集 3 利瑪竇書信集（上）》（台北：輔仁大學、光啟文化事業，1986），頁 23。



今年這座城市的河水又氾濫了，以至於所有房屋都進了水，淹沒了田地，衝垮了房屋，洪災非常嚴重。在我們的會院聚集了許多窮人，他們感受到他們從來不敢奢望的基督徒愛德。我們不多的一些東西也都施捨給了別人，讓他們重建家園，援助貧窮的基督徒，整座城市的人深受教誨。<sup>20</sup>

而在疫情氾濫時，神父們對病人護理備受讚譽。他致信總會長說：

今年這座城市流行一種類似鼠疫的傳染病，我們也正好有機會向他們施行基督徒的愛德。我們竭盡所能地幫助患病的人，而他們也深受感動，因為連他們的親朋好友都不樂意接近他們。<sup>21</sup>

1608 年利瑪竇寫信給他親弟弟，當時瑪切拉塔主教座堂詠禮參議員的安多尼神父（Antonio Ricci）：

自八年前到了北京，始終都在這皇宮內，每天都很忙，我想我也將在此結束我的生命，因為皇帝不希望我離開。在中國我們已有四座會院，分別建立在四座重要的城市中，每一處都有很多人成為基督徒（韶州 1589 年，南昌 1595 年，南京 1599 年，北京 1601 年）：許多教友在大節日都來參與彌撒、辦告解、領聖體，津津有味地聆聽天主的聖言，因此成果非凡；但效果更佳的是藉著那些出版的中文書籍，今年印刷了一本，很受歡迎，所以其他兩三個省也有人重印了它。<sup>22</sup>

該書是指他於 1608 年在北京出版的最新文學作品《畸人十篇》，以中士和西士對話的形式來探討智慧為主題，特別是福音教導，

---

<sup>20</sup> Matteo Ricci, *Lettere*, p.123; 379.

<sup>21</sup> Matteo Ricci, *Lettere*, p.418.

<sup>22</sup> Matteo Ricci, *Lettere*, p.505-507.

與儒家傳統作比較並完善之。他以其驚人的記憶力，加之在羅馬會院學習的增強記憶的方法，在沒有任何圖書館可參考，完成了許多優秀的作品，一方面是為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為福傳及皈依基督信仰做準備。譬如 1605 年出版的《二十五言》，其中一面多次引經據典<sup>23</sup>駁斥佛教，一面也是向中國人傳授有關數學和天文學的西方知識。

1610 年 5 月 3 日，利瑪竇神父筋疲力盡的躺在病床上，5 月 11 日他臨終前對同會兄弟說的最後一句話，可詮釋為其卓絕傳教事業的重要意義：「我的功績就是留給你們一扇敞開的大門，但並非沒有重重危險與磨難。」<sup>24</sup>意思是他完成的工作只不過是剛為中國的福傳及東西方的對話奠定了基礎。直到今日，這扇大門依然敞開著，他的福傳方法顯得比以往更具有現實性。同日，他安息主懷，讓人欣慰的是同會兄弟都尊他為聖人，他完成了一項卓絕非凡的福傳事業。他的離世令眾人悲痛欲絕。

在好神父（利瑪竇）彌留之際，聚集了比平常更多的新教友；當他們見神父去世，立刻放聲大哭，以至於必須由同會兄弟們勸阻並解釋說，義人的逝世應以不同於他人的方式來紀念；事實上，有危險潛存，會讓人覺得過度的悲傷似乎與我們信仰的真理不符，也有損於神父的榮耀。於是，化悲痛為讚頌，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讚美他的英雄美德，稱之為

---

<sup>23</sup> Cf. Margherita Redaelli, *Il mappamondo con la Cina al centro. Fonti antiche e mediazione culturale di Matteo Ricci*, (Firenze: ETS, 2007).

<sup>24</sup> 根據撰寫利瑪竇第一本傳記的作者——艾儒略神父（Giulio Aleni）的敘述，他的最後一句話總結了他福傳事業的意義。Giulio Aleni, *L'Archivio romano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collezione Japonica-Sinica*, III, 23.3b, 摘自 Nicolas Standaert & Adrian Dudink,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from the Roman Archiv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2), Vol. 12, pp.200-225.

聖人與中國的使徒。他們再三懇求，終於說服了一位擅長繪畫的兄弟<sup>25</sup>，讓其為利氏畫一張肖像圖，以安慰眾人。<sup>26</sup>

利瑪竇為福音本位化做出的貢獻，我們無法一一列出，比如他力爭從屬於葡萄牙管轄的澳門獨立出來，而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也贊同利瑪竇提出從澳門取得法律和財政自治的要求<sup>27</sup>；著重培育中國聖職人員等。特別是那些曾努力奮鬥，卻沒有取得成功的使徒事業，譬如成立宗座大使館；請范禮安訪問北京；傳教區的完全獨立自主；使皇帝正式允准在神州大地自由福傳等，非常遺憾這一切均未能實現。但藉著萬曆皇帝御賜利瑪竇的墓地，事實上，最終目標就這樣在天主上智安排中順利達成。

## 二、徐光啟——中國教會三柱石之首

徐光啟是具備「修齊治平」<sup>28</sup>情懷的聖賢典範，也是中國近代科學技術事業的奠基者，他以宗教信仰匡救時弊，挽回世道人心，又以理性科學振興實業，惠及天下蒼生。簡言之，真正的友誼一方面建基於信仰之上，同時也紮根於理性之上。徐閣老是中國基督教史上影響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奉教士大夫，被譽為中國天主教三柱石之首，在信望愛三超德和四樞德方面，均被教友們視為楷模。<sup>29</sup>

### 〈一〉徐光啟的「修身」之道

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的朝廷一品大官徐公，在「修身」

---

<sup>25</sup> 此人為游文輝。

<sup>26</sup> 作者翻譯。若讀者有興趣可以參考國內版本：利瑪竇著，文錚譯，梅歐金校：《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480。

<sup>27</sup> Matteo Ricci, *Lettere*, p.424.

<sup>28</sup> 孔子：《禮記·大學》。

<sup>29</sup> Cf. Sun Xuyi, *La ragione umana nell'evangelizzazione della Cina. Il vero significato di Signore del Cielo di padre Matteo Ricci SJ*, (Bologna: ESD, 2022), pp.507-517.

之道方面，為人坦誠、正直樸實、愛家孝順、生活簡樸、信仰虔誠、追求真善美、看淡官場，真正做到「在其位，謀其政」，清正廉潔、體恤民眾。他在《刻幾何原本序》中強調利瑪竇之學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一一皆精實典要，洞無可疑。」<sup>30</sup> 徐光啟把「修身事天」列為首位，成為重中之重。

在《畸人十篇》中，徐太使與利瑪竇長篇探討了中國人最忌諱的兩個字「死亡」，第三章「常念死候利行為祥」和第四章「常念死候備死後審」，聲稱常默想死亡有五利：力避過堅，克制私欲，淡泊名利，慎防驕傲，死於安樂。<sup>31</sup> 他著有天主教傳道護教的各種善文，並認為基督宗教與儒學之間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故此宣導天主教能夠「補儒易佛」。1616 年他在《辨學章疏》詳細表述了對天主教的深刻認識：「其說以昭事上帝為宗本，以保救身靈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工夫，以遷善改過為入門，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以地獄永殃為作惡之苦報」，又述說「天學」是如何能「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的，並按照科學實證的精神提出幾條測試之法，以證明天學之正確不妄。

他將「聖學」和「實學」緊密相連，在科研實踐中體現出一種超性的使命責任感，並認為科學不僅「代天養民」，還能夠激起人們對仁義的追求。格物窮理（理性科學）雖然屬於「小者」，但人們可以由小見大，看到天主。信仰與理性科學是天主救恩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就如我們在行哀矜時，又可分為神形哀矜兩種，信仰拯救人靈，科學救助身體，靈魂和身體為人而言是不可分的。因此，追求探索科學既是人的美德善行，也能夠為天主作見證。

<sup>30</sup> 朱維錚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 304。

<sup>31</sup> 朱維錚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頁第 448-462。

## 〈二〉徐光啟的齊家之教

在徐光啟僅存的幾封家書中，人們可以看到他的「齊家」之道，在第一封信中就不僅約束家人親戚，還勸其在吃虧後，也不可多事，以安靜為主，更不許多事，切不可報復。在第三、四、五封家函中，他勸家人都應自食其力，造林養蠶，謹防火燭，早晚都應謹慎門戶。在第九封家書中，他擔心家人的安危，關心後輩的教育說：「時危事異，只宜恬默自守為上，教訓諸子尤其是契緊。」<sup>32</sup>

在第十一封《家書》中提到：

外公（即吳小溪）一病遂不起，聞之傷悼痛切……無以報之，所幸者已得進教，又不幸先生不在，臨終不得與解罪，不知汝曾令吳龍與一講悔罪否？此事甚急，凡臨終者即無先生在，不可不自盡也。只要真悔，無不蒙赦矣。

可見其對教規之恪守。同一信中又提到徐光啟在南京教案發生曾去「內侍」秘密打聽消息，可見其對教案一事的關注，又囑咐家人：「如南京先生有到海上者，可收拾西堂與住居也。」又許理和（Erik Zürcher）說《具揭》（又名《辨揭》）署名為龐迪我、熊三拔，實際上為徐光啟所撰。1633年他臥疾之時，仍惦記著傳教士，故有《治曆已有成模懇祈思敘疏》：「但遠臣輩守素學道，不願官職，勞無可酬，惟有量給無礙田房，以為安身養贍之地。」由保存至今的書信就可一窺他對家庭的愛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對老人的愛護、對親朋好友的誠懇勸告、對所承受的冤苦不求報復、對子孫後代的全方位培育，關注日常生活的細節，並為家庭成員推薦的工作。<sup>33</sup>

---

<sup>32</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3），頁 81。

<sup>33</sup> 參閱徐光啟：〈家書〉，《徐光啟全集》IX（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300-317。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頁 80-81。他的家庭三代單傳：其父徐思

1603 年秋，徐光啟專程赴南京會晤利瑪竇，但後者已在京都，光啟在徹夜讀完利瑪竇著的《天主實義》手稿後，於四十一歲時決定接受洗禮，他說利瑪竇「蓋其學無所不窺，而其大者以歸誠上帝，乾乾昭事為宗」。「光啟受洗後第一件事便是邀請神父到上海家鄉開教，1608 年冬，郭居靜（L. Cattaneo）神父便應邀到上海。」<sup>34</sup> 徐光啟不僅自己信仰堅定，虔誠熱心，且傳教心火極大。他在《景教堂碑記》中說：「余惟真主施恩，窮天罄竹，無物可酬，人類中稍足自效者，惟信德為首。」利瑪竇也為他對天主的赤子孝愛之情作見證，「他以極大的虔誠和淚水辦告解和領聖體」。<sup>35</sup> 1604 年，徐光啟一到京城，就去教會辦告解並參與彌撒，含淚虔誠地領聖體，所有見到他的人都深受感動。他幾乎每天都參與彌撒。<sup>36</sup> 1606 年，他在向利瑪竇神父辦告解時，忽然被皇帝召見，但他並沒有中斷聖事，平靜地繼續懺悔，在面聖時求責罰，皇上答道：「徐愛卿忠於天主，也自然會忠於朕，何罪之有？」<sup>37</sup>

---

誠，徐光啟，其子徐驥，孫子輩共九人，五男四女。孫女徐甘第達 *Candide Hiu* (1607-1680) 在歐洲非常著名，因為 Philippe Couplet 寫了一本她的傳記，名為 *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de la Chine* (Paris: Michallet, 1688)。該傳記被譯作多種語言。從他的後裔中湧現出許多司鐸聖召：十一代孫徐允希 (1870-1940) 神父 SJ，天主教學者，曾任上海徐家彙藏書樓主任，1909 年曾編《增訂徐文定公集》八卷本，1938 年他把《許母徐太夫人甘第大事略》從法語譯成中文（王成義編著：《徐光啟家世》，頁 226）。十二代孫徐宗澤 (1886-1947)，耶穌會神父，曾經是《聖教雜誌》主編（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頁 72；《徐光啟家世》，頁 223）；徐宗華神父；徐宗江 (1895-1968) 神父，耶穌會士；徐宗樞 (1896-1970) 神父；徐宗綸神父 (1898-)。徐宗敏神父 (《徐光啟家世》，頁 225)；徐俊興神父 (1931-2019)，耶穌會士。十三代孫徐懋祿神父；徐簡谷神父 (1920-2012)，耶穌會士；徐德祿神父 (1944-2013)。除了從書籍中查找，作者還諮詢過幾位研究徐光啟專家（譬如朱曉紅教授）或後裔（徐俊興神父）等人，只是從徐光啟後裔中的兩房（五個孫子中的兩位）就出了至少十二位神父，至於其他就不可考了。

<sup>34</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頁 75。徐光啟家書第九封：「郭先生何時來？何時去？仍在西園否？教中事切要用心，不可冷漠，一放便易墮落矣。」

<sup>35</sup> Matteo Ricci, *Lettere*, p.397.

<sup>36</sup> 參閱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頁 489。

<sup>37</sup> 參閱朱維錚、李天綱主編：《徐光啟全集》，X，頁 143-144。

徐光啟的傳教心火首先展現在向家人傳福音，譬如其父徐思誠在京城見他每日虔誠祈禱，就向他探問教理，最終被兒子勸化，拋棄了星象占卜，領洗進教，專心事奉天主。他向外人，包括那些詬難他的人傳福音，譬如在上海有一位老翁寫信譴責他拋棄古聖之道二從邪教，徐光啟回信《答鄉人書》，為他詳細解說信仰基督並不違背中華聖賢之道：「天主即儒書所稱上帝也……如臣從君，子從父，何中國殊方之可言乎」。有一日老翁生病，徐光啟親自拜訪，他感激徐翰林的謙虛和愛德，非常樂意聽道，正好應驗了徐光啟在回信中所言：「教中大旨，全在悔罪改過。雖臨終一刻，尚可改舊圖新，免永遠沉淪之苦。」老翁深深地被感化，領洗信教後，才安然去世。<sup>38</sup>

沒有人知道徐光啟帶領多少人信奉了天主教。據文獻記載，僅1623年，他直接影響皈依的就有一百二十人，其中大部分是文人學士和他的學生。他對教會的熱愛也從來不帶著民族主義，因為他對歐洲、印度、越南的基督徒團體很感興趣，並給他們寫了幾封信。<sup>39</sup>他特別關愛災民、病人、老人、囚犯，因此被稱為「窮人之父」，因為他總是向最需要幫助的人施捨；病危臨終時（逝於1633年11月8日）竟然沒錢買普通藥看病，蓋棺之時，身無分文。<sup>40</sup>

### 〈三〉徐光啟的治國之方

在「治國平天下」方面，他屬於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高瞻遠矚，西學東漸，引進西式火器並發展明軍炮兵抵禦後金入侵，見證了明朝逐漸走向衰落，是極力抵禦外侵的愛國者。他引進試種並推廣番薯、良種水稻等高產農作物等傾心竭力實學救國利民。徐驥在《文定公行實》中說：「先文定既早聞家學，膽識過人。弱冠補諸生

---

<sup>38</sup> 參閱羅光：《徐光啟傳》（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頁311。

<sup>39</sup> 參閱鄧恩（H. G. Dunne）著，余三樂、石蓉合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06。

<sup>40</sup> 參閱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207。

高等，食詒學宮，便以天下為己任。」因他看到天災人禍帶給人民的苦難，就試圖用科技救民。儘管當代有不少人主張科學是客觀中立的，但事實上，任何不受良知或道德指導的科技卻常會淪為殺人凶器。徐光啟的科學實踐以人為本，充滿憂國憂民的責任心，宣導「實學」就是因它們皆為國計民生之大事。

在農業方面尤為卓越，因徐公認定其為「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每每聽到「他方之產可以利濟人者」，他就會想方設法地收集、育種、總結經驗並推廣，譬如讓人從福建多次捎回番薯作種，鑽研紅薯在北方種植的各種技術，使之更易栽培且高產，「足以活人者多矣」。他總結棉花種植和蠶繭養殖的技術，改良諸多農作物的種植方式，為提高產量，並為農作技術提供指導，編撰了集中國古代農學之大成，共分六十卷的《農政全書》。

據統計，他一生涉足的科學門類共有農業、水利、天文、氣象、建築、測量、製圖、醫學、機械製造、軍事、音樂和會計等十二個子目，而他的每項研究都是在造福人民的使命責任感下進行與完成的。徐光啟不僅親歷親為，更號召組織人才梯隊在靈性、理性和科技各層面虛心學習，在《簡平儀說序》中說道：「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榘，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還在《曆書總目表》提出，在全面理解後，一定要融會貫通，「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這一切都正是他「修己以安人」《論語·憲問》並胸懷天下的真實寫照。

#### 〈四〉徐光啟的信仰

上海主教金魯賢曾在 2012 年，即徐光啟誕辰 450 周年之際，寫過一封牧函，將徐光啟稱為「一位適合任何時代的人」，又是「科學界和教會的常青樹」，其科學貢獻有目共睹，其宗教信仰卻鮮有人談。然而，身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徐光啟從來沒有把科學與宗教



信仰對立起來，不僅如此，他在領洗入教之後反而更加熱切地追求科學，成績也更為顯著。

不少學者也對徐光啟皈依的「契機」頗感興趣，有人認為徐光啟皈依時，從「大環境」而言，當時處於文化危機的狀態，急需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徐光啟皈依天主教就是對這個危機的有效處理。從「小環境」而言，即從徐光啟自身情況來看，科第失意，母親去世，對人生和死亡的追問，親眼目睹世界地圖後的震撼，在 1600 年他夢見一座聖殿，裡面有三個「小堂」，領洗後於 1605 年才感悟到那是三位一體的形象等，皆為徐光啟皈依的直接原因。<sup>41</sup> 還有其他學者，譬如沈定平在《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說道：「明代末年正值正統儒家信仰已發生危機，多元化社會思想氾濫之際，事實表明，徐光啟與這些社會思潮均有密切的聯繫。」

大部分學者認為徐光啟皈依天主教的契機，從消極面而言是科第失意，而從積極面來看，天學的道德教化和西學的實用是吸引他皈依的兩個主要因素，在他受洗時也就標誌著他走出避世的消極情緒，最終確定了實學救國的人生目標。徐光啟的科舉之路異常艱難，1598 年會試不中，他從京都返滬，「布衣徒步，陋巷不改，閉戶讀書，仍以教授為業。尤銳意當世，不專事經生言，偏閱古今政治得失之林」。1599 年，與程嘉燧隱居山林，「以求志力學於山谷之間」。直到 1603 年領洗入教，這幾年可謂徐光啟心灰意冷之期。自從目睹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起，徐光啟就對西學充滿好奇心並產生了濃厚興趣。沈定平主張徐光啟之所以引入基督教義的必要性主要有三：東海西海心通理通；引入西學返本求實，藉以補綴儒家學風浮躁的疏漏；唯有引入西方的基督教義，才能揭露佛學的謬幻本質，進而消除其對中國社會的深遠影響。

---

<sup>41</sup> Cf. Matteo Ricci, *Lettere*, p.398.

依據宗教社會學家測定「宗教性」（宗教虔誠）標準，需要考慮到信徒「內在」（思想）與「外在」（行為）兩個因素，來分析徐光啟的宗教性，看他是否屬於一位純粹的天主教徒。尚清河認為徐光啟以「內在」因素：以「歸誠上帝」為大，勸人為善為「教戒」，對天主和信仰的深刻理解；與「外在」因素：遵守天主教的教規和禮儀，傳教護教，對信仰的深度反省，按照測定「宗教性」的標準，可以肯定地說，徐光啟是一位純粹（或虔誠）的信徒。繼續深入瞭解徐光啟皈依的真實動機，依其生命佐證主要分為四點。<sup>42</sup>

1. 天學實學：在《辨學章疏》中主張「天學」是如何能「補益王化」，實踐道德教化，益化民氣；程嘉燧在《壽懷西徐翁序》回憶他與徐光啟設館教學於山中的情形時，說徐公「孜孜求學，必將醞釀於詩書，而發揮於事業」。

2. 行善避惡（勸善止惡）：在《辨學章疏》中，徐光啟批評佛教時，也道出了他對當時社會風氣的看法：「空有願治之心，恨無必治之術，於是假借釋氏之說以輔之……謂宜使人為善去惡，不旋踵矣。奈何佛教東來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也。」很顯然，佛教無法成功地勸善止惡，已經喪失了道德建設的作用，而「事天之學」因為有天堂地獄之說，「足以聳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從而「能令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

3. 補儒易佛：徐光啟主張「實心、實學、實行」，當然反對「虛學」，以禪宗為代表的佛教不僅喪失了道德教化的社會功能，又讓儒家改變了一貫積極入世的傳統，而形成了宋明理學。受利瑪竇策略的影響，徐光啟對新儒也持否定態度，這一點在《刻幾何原本序》、《泰西水法序》、《面對三則》等文中均有提及。「補儒」就是改變

---

<sup>42</sup> 參閱尚清和：〈社會轉型與信仰轉向——徐光啟皈依天主教的宗教社會學考察〉，<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3683>（2024.08.12）。

儒家中「虛」學的部分，從大而言，這與「理智趨向」有關，從小而言，這與徐光啟的價值取向有關，特別是中進士之後，對待今儒之態度明確可見，如《題陶士行運甓圖歌》云：「霏屑玄談未終席，胡騎蹂人如亂麻。……誰使神州陸沈者，空復新亭淚成血。」其中可見他對玄學之批評態度。「易佛」之態度在其著作中也有很多，從《辨學章疏》中所提出的「試驗之法」可看到，對佛教與天主教態度之分別是基於二者不同的學科體系，也就是說，前者是虛學，後者是實學，可按照科學方法來檢驗。

4. 補益王化：他在教難來臨時毅然上書，為基督信仰寫奏章辯護，並以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擔保，這是在南京教案發生時徐公呈上的《辨學章疏》：「必欲使人盡為善，則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

因此，在世人眼中，或許認為徐光啟皈依有某種「功利主義」參雜其中，但從福音精神而言，這正是對愛主愛人之新誠命的踐行，因為這種「功利」不是針對他自己而言，而是針對整個人類社會而言的入世博愛，活出了「因你們不屬於世界，而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若 15:19）的基督徒聖召。徐光啟在亂世虐政中堅守良心，是為了天主的最大光榮，為了教會的益處<sup>43</sup>。他的光輝形象在國人心目中巍然不倒，既是愛國愛民的實幹科學家，又是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sup>44</sup>，更是修身事天的好教友。

---

<sup>43</sup> 參閱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頁 74-76；王成義：《徐光啟家世》（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頁 39-43。

<sup>44</sup> 參閱李天綱：〈徐光啟：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摘自《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徐光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33-47。

### 三、徐利二賢在信仰及福傳等方面的交輝

《論語》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子路》），鼓勵人們實踐友仁。亞里士多德亦言，友誼則是一種美德，或至少接近美德，它對我們的生活極為必要，因為它賦予人（存在）活著的意義。<sup>45</sup> 徐利二人之間的深厚友誼不僅局限於科學人文層面的互惠，更在於精神和道德，靈性與福傳的價值。事實上，傳教士們和徐光啟等人對科學的興趣並非以其為終極目的，而是基於科學對德行實踐所固有的傾向，因此，他們作為「科學家」和他們是「智賢者」是密不可分的。「修身事天」的友誼為我們指出那扇通往人們心靈與思想的大門，邁向兄弟情誼和全球互助。

#### 〈一〉以《交友論》為鑒，為友誼殉道

自從踏上中華領土，利瑪竇就對登門拜訪的中國人表現出極大尊重和熱情，同時也能看到拜訪者渴望瞭解與他們截然不同的人地事物，並常常驚歎於他們向他彰顯出的樸素、美德和欽佩。

1595 年在南昌出版的《交友論》是利瑪竇的漢語處女作，它之所以成功絕非偶然，該書由西方聖賢的一百條金句良言組成，主要來自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塞內卡、盎博羅削、奧斯定等人。關於友誼的論著不但使許多中國人印象深刻，而且讓他可以表達自己心中對華人的敬重與愛戴。同年 11 月，贈給建安王一本以友誼為主題的小冊子：「去年我曾致力用中文撰寫《交友論》，都是從我們的書中篩選出的名言警句編輯而成（1596 年 10 月 13 日）。」<sup>46</sup> 幾年後，他又提及該作品說：

---

<sup>45</sup> Cf. Aristotele, *Etica Nicomachea* (Bari: Laterza, 1999).

<sup>46</sup> Matteo Ricci, *Dell'amicizia*, p.337.

《交友論》為我，也為歐洲人爭光不少，比我所做的其他事情影響都大，因為其他科學之類的書籍只介紹西方的科技與藝術，而它則是介紹文學、智慧與修養。因此，許多人都特別喜歡這本書，它在兩處已經由別人印刷（1599年8月14日）。<sup>47</sup>

許多名家曾為《交友論》作序，並多次在各地出版，就可明白它產生的影響之巨大。從馮應京的序言就可窺一斑：

西泰（對利瑪竇的尊稱）子間關入萬里，東遊於中國，為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嗟夫，友之所系大矣哉！<sup>48</sup>

利瑪竇除編著關於友誼的文章，還孜孜不倦地遵照中國禮儀，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與社會各階層禮尚往來。他朋友圈範圍極廣，包括歐洲和中國的朋友。他常與這些朋友保持聯繫，僅從保存下來的信函就可知道當時書信往來的頻繁程度。非常遺憾的是，直到現在我們還沒發現一封利瑪竇曾寫給中國朋友，保存至今的親筆信。在他的信中經常提及禮尚往來的重要性，即使需要付出相當的體力，甚至多次透支，也在所不惜。有一次在他寫信給弟弟安多尼說：「每個地方都有我的很多朋友，他們甚至都不讓我活了，因為我整天都在大廳裡答覆各式各樣的疑問。」在1610年殿試前的一年間，成千上萬的文人學者湧入京城應試，很多人都希望拜訪從不拒絕任何人的西泰就是極好的佐證。禮儀本身要求人在接受拜訪或互換禮物後，幾天之內還需一一回訪。接見與回訪，有時一日竟然多達二十次，但他不辭辛苦，因為這一切能夠給予傳教士極大的美譽，從而保證他們可以在中國長期居住。早在1605年寫道：「我的日常工作是不斷接見高貴的訪客，他們來詢問關於我們的信仰與科學

---

<sup>47</sup> Matteo Ricci, *Dell'amicizia*, pp.363-364.

<sup>48</sup> 朱維錚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頁116。

的事情。」<sup>49</sup> 如此一來，導致操勞過度，最終英年早逝。據馬愛德（Edward Malatesta）的主張，利瑪竇可稱為友誼的殉道者。

## 〈二〉亦師亦友，融東西學

徐光啟與利瑪竇二人亦師亦友，成為世界近代史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佳話，更成為當代福傳的典範。徐光啟年幼利瑪竇近十歲，於 1600 年赴南京拜見其恩師焦竑，首次與耶穌會士利瑪竇會面，二人一見如故。這次與利瑪竇相遇深談的意義重大，後來他談到這次相遇時說：「而餘亦以間遊從請益，獲聞大旨也，則余向所嘆服者……蓋其學無所不窺，而其大者以歸誠上帝，乾乾昭事為宗。」<sup>50</sup> 由此可見，徐光啟不僅對利瑪竇淵博的知識欽佩不已，更被他的善表與傳教熱忱深深感動。

在西學方面，他受教於利瑪竇，深感中國傳統學術欠缺邏輯，而當時中國數學也停滯落後，因而高度重視演繹推理，宣導數學的應用和普及。他說服利瑪竇認同象數之學對國人有幫助，可以「富國足民，代天養民」。而利瑪竇也非常欣賞徐光啟的學識及品德，在日記中讚美到：徐公「天資聰明，品德高尚」，還有「他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及對待聖教事務的態度都為他人樹立了榜樣，為中國的天主教事業注入了巨大的能量」<sup>51</sup>，遂答應和他一起翻譯科學著作，由利瑪竇口傳，徐光啟筆錄，兩人從 1605 年開始合譯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對中國近代科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科學文化福傳的最佳典範。在他們的福傳方式中，他們在中華哲學與道德傳統中不斷努力找尋已存在的聖言種子，不斷探尋新的語言表達及不同路徑，為帶領所有人與基督相遇。正如本篤十六世強調說：

---

<sup>49</sup> Matteo Ricc, *Lettere*, pp.391-392.

<sup>50</sup> [明]徐光啟著，王重民校：《徐光啟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87。

<sup>51</sup> 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頁 338。

儘管利瑪竇神父遇到了很多的困難與誤解，但是他至死忠貞不渝地將這種福傳風格付諸實行，可以說他貫徹的是科學的方法論，以及牧靈工作的策略。它一方面建基於尊重當地人的正當習俗，就是新領洗入教的信友們在接受了基督信仰後不必放棄他們自己的健康習俗，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識到，啟示的真理可以將其更進一步昇華與完善。<sup>52</sup>

從這個角度而言，那些建立在功用和快樂之上的友誼，並非功利主義（更不必說剝削壓榨等），而是建立在科學知識的基礎上。中國友人請利瑪竇翻譯並教他們實用的幾何學、世界地圖、星盤和天文學等理論基礎。也是為了此目的，利瑪竇二十多年來致力於深入研究漢語及其悠久文化歷史，好讓他能掌握神州文化之精髓。他深入研究古典文學，並將四書五經譯成拉丁文<sup>53</sup>，然後作為禮物送給他在歐洲的朋友。他與當時許多士大夫友好往來，其中就有建議他棄僧袍穿儒服的學者瞿太素。因著與中國官員的友誼，利瑪竇得以留居中國；有些學者把它理解為「外交鎖鑰」，認為它是一種有效的文化福傳方式，利瑪竇才進入閉關鎖國的大明帝國。就局部而言，有其合理性，但這種解釋卻未能給出利瑪竇事業的全面視野，因為他是一個開放並時刻準備好適應新世界環境的人，除了基於人性與信仰的真善美之上的友誼，他沒有任何早已預定的策略。

### 〈三〉以基督信仰論友誼

基於功用和快樂之上的友誼有其明顯的不穩定性。那些僅僅是為了功用或快樂而交友的人，只會在他們有需要時，才會成為他人的朋友。這種友誼很容易土崩瓦解，因為朋友之間並不總是平等的；假如其功用或快樂一旦終止，這類友誼也會隨之雲消霧散，

---

<sup>52</sup> 作者翻譯，原文見：Benedictus PP. XVI, *Quarto espleto saeculo ad obitu Matthaei Ricci*, pp.536-538.

<sup>53</sup> Matteo Ricc, *Lettere*, p.349.

因為其根基不牢靠並具有偶然性。顯而易見，友誼應超越這些不穩定的維度，形成一種良好習慣性，從而產生真正的行動，即有德行。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交朋友都有諸多要求，常以美德、平等、自由、真誠、無私、互助、尊重等詞語來表達。以上這些品質為我們闡釋了什麼才是基於人性尊嚴的，也告訴我們如何活出友誼，不是通過那旨在達成自身利益的工具性對話，而是藉著智慧對話，因為它既是源自真理的分享，又能以更高的美善馬首是瞻。

這就是為什麼只有那些建立在美善與真理之上的友誼才能恒常持久。利瑪竇深受中國友人的影響，對基督位格進行闡述的選擇，偏向於華夏儒家尋求「真道」的方法，而不是側重於典型的西方希臘文化中對「真理」的探索。但在福音本位化工作中，他這種神學牧靈的選擇，使那接受好消息宣告的文化更能突出福音本身還未被探索的層面。將基督視為「真道」，即遵照天父的旨意來自我完善之路，可以對信仰的道德層面有不同和互補的諸多理解，譬如，它能夠賦予誠命的概念以更多言行身教的內涵。

在拉丁教會傳統中，源自法律深度內容的誠命具有規範個人行為或團體行為的意義。而在當今西方生活環境中，權威及其監管對個人良心和自我理解都已日漸式微，故將誠命僅僅是當做法律來看待，很有可能導致對話者直接將之拒之門外。但如果給天主的誠命賦予行為內涵，即從信仰出發，讓人不僅「窮則獨善其身」，更能「達則兼善天下」，那麼對於尋求自身人性和靈性成長的人來說，誠命可能會顯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此，信仰一詞的最高意義所表現出來的屬於一種動態關係：與天主及兄弟姐妹們的友誼，其明顯特點必是親和力，即「和藹可親」。

教宗本篤十六世盛讚利瑪竇說：



鑒於他嚴謹的科學事業及其充實的靈性生活，我們不能不被其創新與獨特的才能所感染，他以極尊重的態度，對待中國文化傳統與其道德生活中的一切。事實上，正是由這種態度顯示了他的使命特色，就是在數千年的崇高的中華文明與基督信仰的新穎性之間，努力探索著彼此和諧的可能途徑。基督信仰是解放與振興每一個社會的真正的酵母，福音是使所有人得救的普遍訊息，不論他是來自何種文化與宗教信仰。<sup>54</sup>

利瑪竇和徐光啟等朋友們的分辨力，不僅是為了將基督信仰展示為中國已存在宗教的有效替代品，而是為了呈現為建基於理性，屬於內在連貫性和忠於教會傳統的靈性操練。在教務上，利瑪竇也尊重徐光啟的意見，徐公認為不宜之事就不辦，比如當時利瑪竇想通過結交宦官以獲得永居北京的許可，但徐光啟反對，因為他認為結交宦官很容易捲入派系糾紛，更不利於福傳。

徐光啟與利瑪竇懂得維持良好深厚的人際關係，始終本著服務人民的獻身精神，跟所有人分享自身的精神和物質財富。他們這種對華夏文明的服務精神，以及他們言行一致地活出自己所教導的一切，能幫助我們懂得如何進行各宗教間的對話。二位聖賢的深厚友誼，也告訴我們今日如何才能活出真正友誼，在智慧對話中，他們與對話者一起朝著公共福祉的方向邁進，正如奧覓德（A. Olmi）特別強調的，因為不是通過那旨在達成自身利益的工具性對話，而是藉著源自真理的智慧型對話，才能追求更高尚的美善。<sup>55</sup>

愛在於能「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若 15:13），即作為珍貴禮物獻給他人。要想留在主內，就需要彼此相愛，與其說是為了

---

<sup>54</sup> 作者翻譯，原文見：Benedictus PP. XVI, *Quarto espleto saeculo ad obitu Matthaei Ricci*, pp.536-538.

<sup>55</sup> Cf. Antonio Olmi, *P. Matteo Ricci e san Tomasso d'Aquino. Sette studi sul tomismo sapienziale* (Bologna: ESD, 2020).

相安無事，倒不如說是為了以真心奉獻的精神相互建樹或彼此服務。人們很容易低估了友誼中相互「被選後才能成為朋友」（參閱若 15:16）的層面，即不存在任何強迫，因為「被選」既能突出體現朋友的自由，也能彰顯友誼的相互性。出於愛，耶穌先選擇徐利（我們）做自己的朋友，而他們也自由地選擇留在祂的愛內。正是從他們的深刻體驗出發，才為自己打開了多種可能性：他們的家門和心門都一直敞開著，成為許多追求真善美之人的知心朋友。

因此，凡致力於建立真正友誼的人，一方面學會站在與大眾媒體不同的視角去洞察，另一方面又能夠孜孜不倦地服務於互信對話，並深刻認識到智慧理性將繼續存在，並成為不可替代的適宜途徑，好使我們認識到何者才是對全人類的真與善。每種文化都有各自的價值體系，儘管當今世界的相互交流和文化變遷都在飛速增長，但永遠不會出現世界範圍內的文化大一統：所有民族都將保留其獨特的多樣性。在利瑪竇和徐光啟的友誼中，翻譯研究科學只是邁向「修身事天」階梯的第一步，不斷將其提升到更高境界。因為從他們身上，可以借鑒學習為我們這個時代有益的尊重與熱愛不同文化的能力，超越各種偏見，回避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或征服他人的奢望，更要學習他們的福傳心火和方法、精神與道德境界、科學知識、文化的開放性及前瞻性。他們那種真誠深厚的友誼及相互欣賞的風格，在日益全球化，人類的移動量不斷增大的時代，更是顯得極為適用。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友誼與雙贏互惠的風格在我們這全球化的時代也非常有效實用。

在徐利二位先賢身上，科學、理性與信仰三者達到了輝煌的天然合成。在《坤輿萬國全圖》第三版序言中，利瑪竇寫道：「蓋知天地而可證主宰天地者之至善、至大、至一也。不學者，棄天也，學不歸原天帝，終非學也。」他們不僅以大智慧教導我們，更以生命

見證了對那真理的大愛。他們用盡各種方法，不知疲倦地將那真理無私地傳達給他人。因此，徐光啟和利瑪竇的光輝形象不可磨滅地銘刻於中國人，乃至全球人的記憶與文明中，同樣地，他們天才式的福音本地化及信仰傳播，也成為教會傳教活力最典型的表現形式之一。他們留給了我們一份極寶貴的遺產，直到如今全人類仍然在探索著，以達成和平共處、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從他們留下的這份具有現實意義的精神遺產中，一定會身心靈具獲益匪淺，更能夠激勵我們走上這條友誼之路。

**【Abstract】** In view of today's globalization, friendship is more urgent and important than ever before, because it can unit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peoples, curb various tensions, overcome diverse conflicts, and allow people to live out more deeply human, dignity and the joy of faith. Among the countless models of friendship at home and abroad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I especially want to share the profound friendship between Matteo Ricci and Xu Guangqi. They can be called models of contemporary evangelization, because true friendship originates from God, is rooted in the Words, and lives in human nature while helping build up others. The two sages, Xu and Ricci, respected others from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s, no matter whether they were rich or poor, always based on their dedication to serving others, shared generously and joyously their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ealth with everyone. Their words and deeds were consistent with what they taught, which helped us learn how to use religious beliefs to remedy the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restore the world's moral integrity, and revitalize the industry with rational science to benefit the world. The profou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sages also tells us how to live out a true friendship today. While constantly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they

worked together in the direction of common goods. It was not through instrumental dialogue that aimed to attain self-interests but through intelligent dialogue derived from the truth that they could truly pursue the higher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